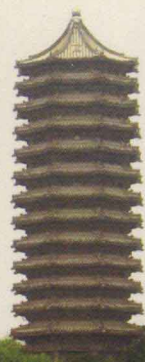


季羨林先生 与北京大学东方学

上

王邦维

主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季羨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 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王邦维◎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羨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全2册 / 王邦维主编. — 银川:阳光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80620-787-1

I. ①季… II. ①王… III. ①季羨林 (1911~2009)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7386 号

季羨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

王邦维 主编

责任编辑 陈文军 谭立群 李少敏 陈 帅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9126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40.75

字 数 600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20-787-1/I·140

定 价 88.00 元(全 2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01 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建立暨季羨林教授执教六十周年志庆(代序)

第一部分

005	季羨林与东方学	陈嘉厚
036	季羨林东西文化观与东南亚文学研究	梁立基
047	拿来·送去与季羨林先生的“送去主义”	叶渭渠
052	季羨林先生的治学精神	黄宝生
056	我们的系主任季羨林教授	贺剑城
060	点点滴滴的永恒记忆	汪大年
064	季老心中的“春天”	孔远志
069	季羨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的创建	李 谋
079	季羨林的“和谐”观	张光璘
089	季羨林先生的留学经历与他的学术成就	王邦维
096	穷搜百代 以竟厥功	葛维钧
110	继往开来 华梵共尊	郁龙余
133	季羨林先生与印度文学	薛克翘
138	季羨林与中印文化交流	王树英
149	季羨林与东方比较文学	孟昭毅
160	季老对敦煌文化研究的一大理论贡献	颜廷亮
170	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看东西文化交流	赵国忠
178	季羨林先生创造了多少财富	刘 烜
186	季老给西方送“大礼”	詹得雄
190	季先生鼓励、提携和指导我从事尼泊尔研究	王宏伟
195	我与母校北大	唐月梅
199	季羨林教授与主题学研究方法	王 立

第二部分

211	《封神演义》中几个与印度有关的人物	金鼎汉
221	《摩诃婆罗多》的正法观	刘安武
234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	李宗华

252	字里行间	段 晴
269	苏菲诗人法利德丁·甘吉·谢格尔	唐孟生
279	美国外语非通用语种的教学与研究	刘曙雄
289	早期佛经中的偈颂翻译	陈 明
301	菲尔多西和《列王纪》	张鸿年
315	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创作道路	仲跻昆
328	阿拉伯音韵图谱	张甲民
343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特点	孙承熙
359	纳吉布·马哈福兹“三部曲”中的女性人物	倪 颖
370	中国小说对越南文学的影响	颜 保
379	从越南喃字诗歌的语言表达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傅成劫
391	儒释道在越南传播的特点	王 彦
401	缅甸的两次文学改革运动	姚秉彦
409	从《琉璃宫史》看东吁王朝的皇族婚姻	杨国影
422	感受与体验:宗教和道德的关系	张玉安
432	汉文学的介入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	裴晓睿
442	泰、缅、柬三国政治文化中的佛教因素	罗 杰
454	作为地方性神圣历史的神话:菲律宾阿拉安—芒扬民族的神话观	史 阳
467	对人认知与日、汉语授受动词对比	徐昌华
475	简析“终止形与连体形同化”对动词活用变迁所施的重要影响	潘金生
491	浅论日语文字系统之特殊性	潘 钧
504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王 浩
513	韩国汉文文学史叙述方法刍议	韦旭昇
530	对一部分高句丽地名的分析	安炳浩
538	方位词“上”字的韩国语释义	韩振乾
549	韩国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	王 丹
567	数字与原始楔文的起源	拱玉书
586	浅析赫梯神灵赞美诗中的修辞手法	李 政
607	从东方国别文学、地域文学到比较文学	魏丽明
620	编后语	

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建立 暨季羨林教授执教六十周年志庆(代序)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日月绕行,八万里成一周天;岁时往复,六十年为一甲子。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肇自1946年东方语文学系的建立,迄今已一甲子六十周年。六十年前,抗战结束,北京大学复迁回故都北平,时任校长的胡适之先生与代校长傅斯年先生以及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策划,决定在北京大学建立东方语文学系,推动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此时季羨林先生留学德国归来,遂被聘为首任系主任,任职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东方语文学系其后又曾改名为东方语言系,再后改为东方语言文学系,再后则改为东方学系。直至1999年,北京大学组建外国语学院,原东方学系一分为三,成为外国语学院辖下的东方语言文化系、日本语言文化系和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六十年来,结构或经调整,名称稍有小异,而宗旨则无改变,即在北京大学开展东方语言教学,研究东方语言与文化,建立和建设中国的东方学学科,服务国家,不辱民族,以跻身于世界文化学术之林。

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成立之初,虽规模不大,教员甚少,但在季羨林先生带领之下,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来,队伍逐步扩大,增设多种语言,拓宽教学和研究范围,各方面均获得长足发展。至六十年代,经全系教员不懈的努力,已成为北京大学诸多学科重要的一部分。其后虽经“文革”挫折,但“文革”结束以后,则又生机重现,八十及九十年代,在学科建设上更有根本性的进步。近十年来,与国家经济发展同步,东方学学科建设又得到极大的发展。教学研究,硕果累累,人才辈出,为国内东方研究之领军,洵非虚言。

六十年来,季羨林先生的学术生涯与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紧密相连。先生任北京大学东方学系系主任前后逾三十年。始则筹划专业设置,继则倡导学术研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著作等身,中国东方学研究开创至今,有今日之

季羨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
规模与水平,先生厥功甚伟,贡献至大。宏文大著,流传于天下;道德文章,享誉于神州。思念及此,诸位同仁及学生弟子无不欢庆感激。

值此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建立六十周年之际,又欣逢季羨林先生九十五华诞并执教六十周年,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联合东方语言文化系、日本语言文化系、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共同举办庆祝活动,一则回顾学科的历史,彰显学科建设的成就,展望学科的未来,二则感念季羨林先生对学科建设的贡献,并恭祝先生长寿健康,同时缅怀几代教员辛勤奉献的业绩。斯盛事也,诚邀新老系友、校友、各位朋友,话成就于当下,展宏图于未来,同乐同庆,共成佳会。

王邦维 撰稿

2006年5月4日

第一部分

季羨林与东方学

●陈嘉厚

大家知道,季羨林老教授是我国享誉中外的著名东方学家,为了深入研究季老与东方学的关系,我想有必要先简略谈一谈东方学的含义、产生及其发展变化。

《辞海》(2009年版)对东方学的界定是:“研究东方(亚洲、东北非洲)各国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艺术、宗教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的总称。产生于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18~19世纪以来随着古文字译解的成功,该学科有新的发展,并出现了埃及学、亚述学等专门学科。”

《辞海》对东方学的界定,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准确和明确的。第一,它指出了东方学的学术范围是研究语言和文化,而文化指的又是广义的文化,涵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诸学科。第二,它指出了东方学的地理范围是亚洲和东北非洲的国家。第三,它指出了东方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也就是说,东方学的产生是出于欧洲资本主义对东方各国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需要,是为欧洲殖民主义奴役东方服务之学,对东方进行文化侵略之学,是欧洲人的东方学。这些研究东方的欧洲学人被称为“东方学家”,他们中虽有热爱东方文化,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的学者,但多数人还是殖民主义的御用学者。第四,它指出了东方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不断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逐渐扩大与深化,学科内部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蒙古学等等。

现在,我再就20世纪以来东方学的发展变化,补充几点个人的意见。

第一,20世纪40年代以后,是西方殖民主义崩溃和结束的年代,东方各国先后获得了独立解放,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和建设,终于在20世纪末

21 世纪初迎来了新的崛起,复兴之火已成为燎原之势,21 世纪将成为东方文化的时代。

第二,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东方学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逐渐由殖民主义奴役东方、对东方进行文化侵略之学变成了东方人建设东方、复兴东方文化之学,变成了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合作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之学;逐渐由欧洲学人独揽的东方学变成了以东方学人为主体的东方学。不过,殖民主义对东方的数百年侵略与统治留下的历史污迹,短期内还难于完全涤除,所以大家时常会感到“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影响的存在,为西方利益服务的欧美东方学家也还大有人在;但可喜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欧美东方学家致力于促进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交流与合作,致力于共同发展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

还在 20 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已经到了末期,东方各国人民开始觉醒,他们中一些热爱东方文化和立志弘扬东方文化的学人,投身于东方学的学习与研究。更有少数先知先觉者,志在创建东方人自己的东方学,促进东方文化复兴,再创辉煌。季老就是这些老一辈东方学家之一。季老说他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1]。他认为,“一个人不但要爱国,还要爱人类、爱生命、爱自然”^[2]。这使他“‘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内心永远充满忧患意识”^[3]。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他产生复兴中华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强烈历史使命感,立志创建现代中国东方学。

第三,东方学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现在,东方学除了原有的分别研究东方各国的语言文字、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学科和埃及学、亚述学等等专门学科外,又出现了许多跨学科、跨国家、跨地区,乃至跨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分支学科,如中东研究、南亚研究、亚太研究、中日关系研究、中印关系研究、东南亚华人研究、东方文学研究、东方戏剧研究、东方哲学研究、东方古文明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

东方学就谈到这里。现在,我们可以进入本文《季羨林与东方学》这个主题了。

总的来说,季老是当代世界东方学的泰斗、一代宗师,是现代中国东方学的缔造者、引路人,对东方学作出了创造性的杰出贡献,亦即是对中国文化、东

[1][2][3] 张光璠. 季羨林先生[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427.

方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杰出贡献。下面将分别加以论述。

一、季老是当代世界东方学的泰斗、一代宗师

我之所以这样评价季老在当代世界东方学的地位,主要根据是季老在东方学研究领域之广、学术造诣之深、学术成果之多、对东方学发展贡献之大、学风学德之高,在当今世界,恐怕没有一位东方学家能与他相比。

季老把人类文化概括为四大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说季老的学术研究领域广,若以人类文化四大体系来衡量,季老则是会通四大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很多领域有精深的研究。换言之,季老是个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的文化学术大师。

说季老的学术成果,用“辉煌”二字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根据《季羨林先生传》一书的作者张光璠先生提供的资料,仅仅“从1978年到2002年的二十四年中,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约略统计,季羨林撰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一部学术著作。这十一部著作是:《〈罗摩衍那〉初探》《〈大唐西域记〉校注》(合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导论》《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这些论文和著作涵盖的内容包括: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糖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等”^[1]。如果再加上翻译、散文及杂文创作,则季老的研究范围就更广了。

季老在67岁至91岁高龄之年的24年里完成如此浩繁而艰深的学术论著,若不是成果摆在那里(已收入24卷本的《季羨林文集》),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著名学者周一良先生在《〈季羨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序》中是这样评价他的:“羨林兄在十多个文化学术领域或层面的成就和乾隆帝号称‘十全武功’的军事成就相比较,不是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得多么?”周先生这一比较,生

[1] 张光璠. 季羨林先生[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398-427.

动地说明了季老的学术成就——文功比乾隆帝的十全武功更加辉煌多彩,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位居前列。

季老的学术论著水平之高是学界公认的,而最突出的特点是他那学术上的大无畏气魄和创新精神。下面是季老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季老说:“我喜欢胡思乱想,而且我还有一些怪想法。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某一门学问的专家,对他这一门学问钻得太深,钻得太透,或者也可以说,钻得过深,钻得过透,想问题反而缩手缩脚,临深履薄,战战兢兢,有如一个细菌学家,在他眼中,到处是细菌,反而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喝,窘态可掬。一个外行人,或者半外行人,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他往往能看到真正专家、真正内行所看不到或者说不敢看到的东西。我对于义理之学就是一个初生的犊子。我绝不敢说,我看到的想到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相信,我的意见是一些专家绝对不敢想更不敢说的。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如果没有极少数不肯受钳制,不肯走老路,不肯故步自封的初生犊子敢于发石破天惊的议论的话,则人类进步必将缓慢得多。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常人所说的‘真理与谬误之间只差毫厘’、‘真理过一分就是谬误’。一个敢思考敢说话的人,说对了了不得,说错了不得了。因此,我们决不能任意胡说八道。”^[1]

季老总是站在学科的前沿,每项研究,必求有所发现,每篇文章,必求有新意。所以他的许多学术论著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季老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学术著作:《中华蔗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和《中国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糖史国外有人写过,但只是作为一种科技史来写。季老的《糖史》既是一部科技史,更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因为季老独辟蹊径,主要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沿着糖的传播历程,探索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进而探寻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在这里,我们看到季老在学术上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再说季老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它的英译本在德国出版后,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让美、法、德、日等外国学者不能不刮目相看,因为至今,世界上唯有季老译释过吐火罗文残卷,而且是数量多达44张88页的残卷。《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全剧27幕,大概是世界上最长的剧本,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2]

季老的成功还在于他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学德。这里,我想引几段季老

[1] 季羨林:《学海泛槎——季羨林自述》[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282-283.

[2] 张光璠:《季羨林先生》[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405-408.

自己的经验之谈。季老一再谈到做学问要有“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的精神。他说：“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学者，在某一个时期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问题，成果一出，立即罢手。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有时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认其为真理的学说，时过境迁，还有人提出异议。”^[1]在谈及搜集资料时，季老认为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他说：“不管用什么办法，搜集资料决不能偷懒，决不能偷工减料，形象的说法就是要有竭泽而渔的魄力……科学研究工作没有什么捷径，一靠勤奋，二靠个人的天赋，而前者尤为重要。我个人认为，学者的大忌是仅靠手边一点搜集到的资料，就茫然做出重大的结论。”^[2]说到学术研究中的考证问题，季老认为“科学研究工作贵在求真，而考据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至于考证的工拙精粗，完全决定于你的学术修养和思想方法。少学欠术的人，属于马大哈一类的人，是搞不好考证工作的。死板僵硬，墨守成规，不敢越前人雷池一步的人，也是搞不好考证的。在这里，我又要引用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胆越大越好。哥白尼敢于假设地球能转动，胆可谓大矣。然而只凭大胆是不行的，必须还有小心的求证。求证，越小心越好。这里需要的是极广泛搜集资料的能力，穷极毫末分析资料的能力，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然后得出的结论才能比较可靠。这里面还有一个学术道德或学术良心的问题。”^[3]关于对待搜集资料和考证的态度，季老在对糖史的17年研究工作中，更是以身示范。为了从糖的传播历程中探索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进而探寻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季老从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搜集资料，寻找证据。其中有两年时间，天天跑北大图书馆，查《四库全书》，把《二十四史》翻阅了一遍。季老说，他查阅的中外资料，“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几十万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通常一本40万字汉文书，约500页，即使以读了20万页计算，季老为写《糖史》阅读的资料至少有400本。^[4]这，就是“季羨林学风”！这，就是“季羨林治学精神”！

季老是非常重视学德的，他说：“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

[1][2][3] 季羨林. 学海泛槎——季羨林自述[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302.

[4] 张光璠. 季羨林先生[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402.

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在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在国际上和我们国内,这样的骗子亦非少见。这样的骗局绝不会隐瞒很久的,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齿于士林,因而自杀者也是有过的。这种学术骗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于今为烈。我们学坛和文坛上的剽窃大案时有所闻,我们千万要引以为鉴戒……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上面这些大骗或者小骗,我都从来没有干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干。”^[1]又说:“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谦虚,做学问更是如此。如果一个学者,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老年的,觉得自己的学问已经够大的,没有必要再进行了,他就不会再有进步。事实上,不管你搞哪一门学问,绝不会有搞得完全彻底一点问题也不留的。人即使能活上一千年,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在做学问上谦虚,不但表示这个人有道德,也表示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的。”^[2]如何正确对待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是关系一个学者学风学德的问题,季老很坦诚地说:“我对于学术上不同的观点,最初也不够冷静。仔细检查自己内心的活动,不冷静的原因绝不是什么面子问题,而是觉得别人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或者认为别人并不真正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自己的观点,自己心里十分别扭,简直是堵得难受,所以才不冷静。最近若干年来,自己在这方面有了进步。首先,我认为,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样……要求别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样,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不管多么离奇的想法,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处的。采取其合理之处,扬弃其不合理之处,是唯一正确的办法。至于有人无理攻击,也用不着真正的生气。我有一个怪论: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没有朋友,也不可能没有非朋友。我在这里不用‘敌人’这个词,而用‘非朋友’,是因为非朋友不一定是敌人。最后,我还认为,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它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梁任公说:‘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学者的态度。”^[3]如何做学问,当然也关系到学风问题,季老主张“必须中西兼通,中外结合,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他说:“我个人认为,居今之世而言治

[1][2][3] 季羨林. 学海泛槎——季羨林自述[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306,307,310,314.

学问,绝不能坐井观天……我们中国学者,包括中国国学在内,对外国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绝不能视若无睹。那样不利于我们自己学问的进步,也不利于国与国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年轻学者,不管你是哪一门,哪一科,尽快掌握外语。只有这样,中国的声音才能传向全球。”^[1]

季老不服老,古稀之年成了他学术成就最辉煌的时段,让人们懂得什么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那拼命硬干、锲而不舍、严谨大胆、求真求新、高瞻远瞩、虚怀若谷、舍身求法的治学精神和学风学德,一向为海内外学术界所敬重,真不愧为当代世界东方学的泰斗、一代宗师!

二、季老是现代中国东方学的缔造者、引路人

在季老之前或与季老同辈的中国学者中,已有不少东方学家,只是中国早时候没有“东方学家”这样的称谓。古代的东方学家,如唐代僧人玄奘(602~664),他赴印度取经,历尽艰险,往返17年,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法相宗创始人,译出大小乘经论共75部,著有《大唐西域记》一书。当代的东方学家,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梵澄(1909~2000),曾在印度待了33年,有“当代玄奘”之称。据报载:徐通晓国学,精通梵文、拉丁文、古希腊文等9种语言,在中西哲学、宗教、文艺和诗歌的每一领域都做过了深入研究,是位集中、印、西学于一身的哲人、学术大师、翻译家,有《徐梵澄文集》16卷传世。

玄奘献身佛学,翻译大量佛经,有弟子数千。徐梵澄献身文化学术研究,与翻译,不收弟子门徒,孤独一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做学问。季老和玄奘、徐梵澄有共同之处,都是学梵文,研究佛教,与印度文化结缘的。季老还在求学时就很崇敬玄奘,深受其拼命硬干、锲而不舍、不畏艰险、舍身求法精神的影响,因而有一种“玄奘情结”,曾以“齐奘”的笔名写文章,后来在做学术研究遇到什么大困难或挫折时,常以玄奘的“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大无畏精神激励自己。季老也西行取“经”,不过不是去印度,而是去德国,在几位热爱印度文化的德国教授——东方学家的严格训练和悉心传授下,十年取得了“东方学”真经。季老又与玄奘、徐梵澄两位不同,他没有局限于自己专攻的“术业”佛教梵语与佛教史的研究,而是扩而大之,以传承、弘扬和复兴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为己任,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爱

[1] 季羡林.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315-316.

国、爱人类、爱生命、爱自然。

季老深知,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独木不成林,必须在自己的祖国创建现代中国东方学,造就一支宏大的中国东方学研究队伍。办法有两条:一条是以自己的东方学研究实践和成绩,率先垂范。关于这一条后面还将说到。另一条是通过办教育,从零开始,从打基础开始,着手培养东方学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才是长久之计。所以季老留德归来,北京大学要聘他任教,正合心意,欣然应聘,于1946年在北大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是希望利用北大这片园地培育中国东方学家的幼苗,为创建现代中国东方学准备学术力量。

办教育这条路是一条漫长之路,建系初期,连他这位系主任在内才四名教师,四种语言,学生更少,全系师生总共“六七个人,七八条枪”,是北大最小的系。解放初,因国家急需大量东方语人才,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迅速发展壮大,至1952年已设有蒙古语、朝鲜语、日语、印尼语、越南语、缅甸语、泰语、印地语、阿拉伯语等9个专业,不久又增设了乌尔都语和波斯语两个专业。教师100多人,学生500多人,成为北大最大的系,也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东方语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季老喜出望外,但系务工作顿时繁忙起来,“每天从早忙到晚,忙得脚丫子朝天”。尽管到改革开放前,东语系的培养目标一直局限于培养东方语翻译人才,而不是直接培养东方学研究人才,但是季老始终满怀信心,筚路蓝缕,辛勤耕耘东方语文系这一亩三分地。因为他深信,只要每年有一批毕业生分配到全国高校、机关团体和科研机构工作,这就好比把一批东方学种子撒向全国,不久这些种子就可能在那里生根、发芽,十年二十年后长成了千万棵挺拔的大树,形成一大片郁郁葱葱的东方学之林。学生毕业时虽然只掌握一种东方语,知识面也不宽,研究能力差,但是他们年轻,又有大学的文化基础和训练,一旦投入所在部门的工作,日积月累,就会逐渐扩大知识面,逐渐提高研究能力,最终成为这个部门,或者说东方学某一领域的业务骨干、专家。有的人再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还可能成为东方学多个领域的专家。果不其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季老的弟子,弟子的弟子,已是桃李满天下,东方学之树蔚然成林。用季老的话说:“我们初建系时,在全国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号’,今天则是南北许多大学都有了东方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等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我们的同行遍天下了。顺便说一句,这些机构以及外文出版社、中央广播电台、中国画报社等等地方,主管东方语言的大多数也是我们系的毕业